

诤友与功臣：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平议

张宗友¹

(南京大学 文学院, 江苏 南京 210023)

【摘要】 司马朝军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是现代学术视野下第一部专门就《经义考》某一门类进行深入的经学文献整理专著。作者之旨趣,在于考溯《通说》引据资料之初源,或兼列其他可能之出处,或兼释所引文献,或备列引据文献之全本,或兼考相关文献之异同等。该书虽偶有不足,而成果极为丰硕,为《经义考》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,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。

【关键词】 《经义考》 司马朝军 平议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Z126. 27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: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: 1671-3079(2020)01-0005-10

《经义考》是清初学者朱彝尊(1629-1709)编纂的一部经籍总目,共分30个门类,其中卷二九五至卷二九八,系“通说”部分。司马朝军先生对该部分进行专题研究,相关成果以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之名收入其《国故新证》一书(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0年版)。《国故新证》凡七篇:《论卦辞深层结构》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《〈经解入门〉辨伪十题》《〈经解入门〉待质录》《论司马迁的历史地位》《〈乐庵语录〉真伪考》《〈黄侃传〉徐复序辨伪》。从主题上看,《国故新证》是一部以讨论经史之学及辨伪为主的学术论集。该书正文凡390页,全书篇幅达36万余字。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系此书第二篇,从体量上看,内容多达270页,约25万字,约占全书篇幅70%,其已然能自成一书。格于论集体例,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并无序、跋等发凡起例之文字,惟在文章开篇,有简要之缘起(见下引)。其实,司马朝军先生撰写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之志意,业已于2009年冬形诸文字,即《〈经义考通说疏证〉序跋》(由序、跋各一篇组成),刊于《出版科学》2011年第1期,即《国故新证》行世之次年。可见,作者已将有关《通说》之专题研究,定名为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,惟囿于论集体例,未将序跋载入《国故新证》。据此,本文将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及其序跋,视作一种著述之整体,并按《〈经义考通说疏证〉序跋》题名之例,径称为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(以下简称《疏证》)。

《疏证》是现代学术视野与规范下第一种有关《经义考》某一门类文献之专题研究著作,属于经学文献整理、研究范畴,在《经义考》研究史、学术史上具有独特之地位。《疏证》之缘起、贡献与经验,理应引起学界之重视。

目前,学界对《疏证》之注意与研究,有陈开林所撰《〈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〉补正》(刊于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》2015年第2期)、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引文考辨十二则》(刊于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3期)。前文针对《疏证》“不切及错误之处,略作补证”^{[1]67},后文针对《疏证》“待考”的条目,“择取十二则予以考辨”^{[2]110}。可见二文旨趣分别在纠《疏证》之讹误、补《疏证》之未备,而于《疏证》之撰述缘起、疏证实绩及其在经学文献整理方面之意义,未予讨论。

一、《疏证》之缘起

《经义考·通说》分《说经》《说纬》两个部分,前者3卷,后者1卷,合计4卷。《疏证》因此分为4节:“《经义考·通说

¹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(17BZW118)

作者简介:张宗友(1973—),男,安徽金寨人,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文学博士,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、朱彝尊专题研究。

一·说经上》疏证” “《经义考·通说二·说经中》疏证” “《经义考·通说三·说经下》疏证” “《经义考·通说四·说纬》疏证”。

《疏证》开篇,有简要之缘起:

清儒朱彝尊撰《经义考》三百卷,为经学研究的必备之书,其《通说》四卷撮录自孔子迄清初诸儒有关经学的观点,资料极其丰富,但未一一注明出处,不便于研究者使用,加以错讹衍夺,所在多有,今试为之疏通证明,补所未逮,或于经学不无小补云尔。^{[3]13}

此段缘起,首先肯定《经义考》的学术价值(“经学研究的必备之书”),继而指出两大缺点:1)未“一一注明”所录资料之“出处”;2)“错讹衍夺,所在多有”。那么,作者“为之疏通证明,补所未逮”之目的,应当有二:一是考出《经义考》所录资料之出处;二是校正“错讹衍夺”的文字之误。但上述文字十分简略,内容有限,尚不足以充分说明作者撰写《疏证》之志意。

《疏证》作者司马朝军先生,以研治四库学蜚声学界,著有《〈四库全书总目〉研究》《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》等。对《经义考》之注意,起源于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研究:

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往往只有在研究过程中才会被发现。自从开始研究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我就发现了不少相关课题,关于《经义考》的溯源即为其中一例。《经义考》与《总目》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,我在研究《总目》之初就与它打上了交道。因此,选择《经义考》,对于我来说,并非偶然,而是必然。在追溯《总目》编纂来源时,凡属涉及《经义考》的条目,我就不厌其烦地查阅原书。经过比勘,我发现了《经义考》存在大量错误,还特地写过考证文章予以驳正。^{[4]108}

《经义考》中存在的问题,引发了朝军先生的研究兴趣:

乾嘉时期的一位大儒翁方纲在《苏斋笔记》中指出:“《经义考》于每书之序多删去其岁月,观者何而考其师承之绪及其先后之迹乎?又所载每书考辨论说皆浑称某人曰,不注其出于某书、某注、某集,则其言之指归无由见,而于学人参稽互证之处无所裨助。”删去岁月,不注出处,此二点正是《经义考》的最大缺点,翁方纲洞若观火,不可谓之苛论。……这些致命弱点无疑大大降低了它的学术价值,也影响了它作为工具书的使用效率。^{[4]106-107}

如何解决《经义考》中存在的问题?在学界既有研究实践的基础上,朝军先生对研治《经义考》的学术方法进行了探索:

张宗友博士认为:“对《经义考》所录资料,考溯其源,校核其文,补其未备,从而为学界提供完善的可资利用的文本,即为颇具现实意义和切实可行的课题。”(《经义考研究》第344页,中华书局2009年版)杨果霖先生亦有“还原其原始的出处”的看法,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笔者早在世纪之交就注意及此,在研究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同时,也开始积累相关资料,准备做《经义考》的溯源校勘工作。^{[4]107-108}

基于上述对《经义考》文本溯源、校勘之重要性的认识,朝军先生“发愿在此方面有所突破,且以最笨的办法去获取最佳的效果”,为此:

我采取了张果老倒骑驴的办法,首先整理最后的四卷,即《通说》部分。《通说》四卷撮录自孔子迄清初诸儒有关经学的观点,资料极其丰富,但未一一注明出处,不便于研究者使用。加以错讹衍夺,所在都有。我开始一条一条地查找原始出处,补充史料,校勘文字。……经过我们的史料溯源,无疑将大大提升其学术价值,并为经学话语的重构准备丰富的资料,其意义是每一个经学研究者都不难理解的。^{[4]108}

综上,司马朝军先生因研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而发现《经义考》之重要性与研究价值,通过溯源、校勘的方法研治此书,而首

及于《通说》部分。《疏证》即为其学术结晶。

二、《疏证》之学术成就

《经义考》之《通说》部分凡四卷,包括《说经》3卷、《说纬》1卷。各卷均引前儒或某种文献内有关经典阐释的文字,体现出历代关于经典的认知。所辑文字,《说经上》有95条,《说经中》有110条,《说经下》有94条,《说纬》有98条;另有朱彝尊按语5条。以上合计,共有402条。实际上,由于某条之内,往往不止一则资料(通常以“又曰”领起),因此,实际辑录之数据,近500则。^{[1]67}

《疏证》是司马朝军教授对《通说》四卷进行溯源、校勘的学术结晶,成果极为丰硕。

(一) 考溯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之初源

据统计,除61则资料“待考”外,《疏证》共考出《经义考》438则引据资料之出处。^{[2]110}在考溯初源时,《疏证》体式较为灵活。

1. 径明文献初源

如《说经上》第十条(“庄周曰”):“《诗》以道志,《书》以道事,《礼》以道行,《乐》以道和,《易》以道阴阳,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

语见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。^{[3]15}

又如《说经上》第十五条(“陆贾曰”):“天生万物,以地养之,圣人成之,定《五经》,明六艺。《鹿鸣》以仁求其群,《关雎》以义鸣其雄,《春秋》以仁义贬绝,《诗》以仁义存亡,《乾》、《坤》以仁和合,八卦以义相承,《书》以仁叙九族,君臣以义制忠,《礼》以仁尽节,《乐》以礼升降。学之者明,失之者昏,背之者亡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

语见汉陆贾《新语》卷上《道基第一》。^{[3]17}

按:此类断语简要果决。《庄子》《新语》非稀见或亡佚之书,通行易得,无须辞费。

2. 兼列其他可能出处

如《说经上》第八条(“齐太史子与曰”):“孔子生于衰周,先王典籍错乱无纪,而乃论百家之遗记,考正其义,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,删《诗》述《书》,定《礼》理《乐》,制作《春秋》,赞明《易》道,垂训后嗣,以为法式,何甚盛也!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

语见《孔子家语》卷九《本姓解》。又见宋杨简《先圣大训》卷六、宋胡仔《孔子编年》卷五、《绎史》卷八六之三。^{[3]15}

按:《疏证》指出本条文献之初源(《孔子家语》),但同时列出宋儒杨简、胡仔及清初学者马驥(1621—1673)之著述。朱彝尊治学以博雅精勤著称,杨、胡、马三氏之著述,均有可能在其取材之列。此类疏证,颇见作者之匠心。

又如《说经上》第四十条(“张华曰”):“圣人制作曰经,贤者著述曰传,曰记,曰章句,曰解,曰论,曰读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

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

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六:“圣人制作曰经,贤者著述曰传。郑玄注《毛诗》曰笺,不解此意。或云,毛公尝为北海郡守,玄是此郡人,故以为敬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六〇八引《博物志》曰:“圣人制作曰经,贤者著述曰记,曰章句,曰解,曰论,曰读。”唐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卷九五引张华《博物志》云:“圣人制作曰经,贤者著述曰传记,曰章句,曰解,曰论,曰注。”^{[3]37}

按:《疏证》指出本条文献之初源(《博物志》),而文本有差异;复列出文本相近者两种,分别载于《北堂书钞》《太平御览》。后二者与《经义考》所载者相近,可能均在朱彝尊取材之列。

3. 兼释所引文献

如《说经上》第一条(“《经解》”):“孔子曰:‘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《诗》教也……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……《春秋》之失乱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而不愚,则深于《诗》者也……属辞比事而不乱,则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

《礼记注疏》卷五〇:《正义》曰:“《经解》一篇,总是孔子之言,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。”^{[3]13}

又如,《说经上》第四条(“《春秋演孔图》曰”):“孔子作法五经,运之天地,稽之图象,质于三王,施之四海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

明孔穀编《古微书》卷八。关于《春秋演孔图》,原注云:“此端为血书鸟图而述也,故以演孔立名,而旁及帝王。”^{[3]14}

按:《疏证》不仅标明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之出处,还对引据文献所在篇目(如《经解》)或所从出之原始文献(如《春秋演孔图》),引用前人注语略加说明,无疑有助于对所引文献之理解,起“疏通证明”之用。

4. 备列引据文献之全本

如《说经上》第十六条(“韩婴曰”):“千举万变,其道不穷,六经是也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

汉韩婴《韩诗外传》卷五:儒者,儒也,儒之为言无也,不易之术也。千举万变,其道不穷,六经是也。若夫君臣之义,父子之亲,夫妇之别,朋友之序,此儒者之所谨守,日切磋而不舍也。虽居穷巷陋室之下,而内不足以充虚,外不足以盖形,无置锥之地,明察足以持天下,大举在人上,则王公之材也。小用使在位,则社稷之臣也。虽岩居穴处,而王侯不能与争名,何也?仁义之化存尔。如使王者,听其言,信其行,则唐虞之法可得而观,颂声可得而听。《诗》曰:“先民有言,询于蓍莪。”取谋之博也。^{[3]17}

按:朱彝尊取《韩诗外传》中数语,突出“六经”之“千举万变,其道不穷”。然“六经”何以如此?《外传》中对“儒”之含义、职守、功用加以解读,说明“儒”所谨守之“君臣之义”等,均源出“六经”。《疏证》还原“千举万变,其道不穷”之境,当然有助于对其文之理解。此类疏证,可谓元元本本,极为明了,朱彝尊引据时所作之改动及其讹误,均能一目了然。

5. 兼考其他文献之异同

如《说经上》第四十一条(“乙瑛曰”):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制《孝经》,演《易·系辞》,经纬天地,幽赞神明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

《幸鲁盛典》卷八《汉鲁相置孔子庙百石卒史碑》引其文曰：“司徒臣雄、司空臣戒稽首言：鲁前相瑛书言，诏书崇圣道，勉六艺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经》，演《易》系辞，经纬天地，幽赞神明。”《五礼通考》卷一二一同。宋欧阳修《集古录》卷二删去“删述五经”四字，《隶释》卷一阙“删述”二字。乙瑛字少卿，平原高唐人。^{[3]30}

按：《疏证》根据碑文，不仅列出文献初源，而且对《五礼通考》《集古录》《隶释》等采录此碑之文本，予以检视，载其同异。

（二）校正《经义考》引据之误

如《说经上》第五十四条（“葛洪曰”）：“《五经》为道德之渊海。”（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）《疏证》云：

《抱朴子外篇·尚博》：“抱朴子曰：正经为道义之渊海，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仰而比之，则景星之佐三辰也；俯而方之，则林薄之裨嵩岳也。虽津涂殊辟，而归于进德；虽难于举趾，而合于兴化。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，操纲领而得一致焉。”按：正经，指儒家经典。而《经义考》误作“五经”。^{[3]38-39}

又如《说纬》第四条（“班固曰”）：“圣人作经，贤者纬之。”（《经义考》卷二九八。）《疏证》指出，此语本诸孟康为《汉书叙传》所作之注。班固原文为：“登孔颢而上下兮，纬群龙之所经。”孟康注云：“孔，甚也。圣人作经，贤者纬之也。”《疏证》因申论云：

今按：此处将孟康之注文误读为班固之正文，鲁莽灭裂，不足为训。^{[3]262}

按：以上两例，《疏证》分别校出《经义考》引据之误：前例将“正经”误作“五经”，后例误将注文当作正文。

（三）校正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之误

例如：《说经上》第四十四条（“荀悦又曰”）：“道之本，仁义而已矣，五典以经之，群籍以纬之，施之当时则为道德，垂之后世则为典经。”（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）《疏证》云：

南朝宋范曄《后汉书》卷九二《荀悦传》：“夫道之为本，仁义而已矣。五典以经之，群籍以纬之，咏之歌之，弦之舞之，前监既明，后复申之。故古之圣王，其于仁义也，申重而已。”汉荀悦《前汉纪》卷二五：“施之当时，则为道德；垂之后世，则为典经。皆所以总统纲纪，崇立王业。”^{[3]32}

按：以上《疏证》考其出处，复加“今按”云：“此段本为来源不同的材料，而被朱彝尊捏合为一。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一书的整理者不明其故，该书第八册第775页误点为：‘道之本，仁义而已矣，五典以经之，群籍以纬之、施之，当时则为道德，垂之后世则为典经。’‘施之当时’与‘垂之后世’相对成文。”^{[3]32}事实上，以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为基础，递经覆校、审读之《经义考新校》，此处仍沿误未改。^{[5]5335}由于《国故新证》与《经义考新校》均刊行于2010年，《经义考新校》整理者因此无法利用《疏证》此处成果。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《经义考新校》之误，在于整理之时，未能采用考溯文献初源的方法。

三、《疏证》指瑕

《疏证》是第一部针对《经义考》某一门类进行疏通证明的专著，以考溯引据文献之初源、进行文本校正为旨趣，属于经学文献整理、考证之范畴。朱彝尊治学，以博雅精勤著称，《经义考》引据极为浩博，因此，考溯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之初源，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：其一，工作量大，极费时力；其二，很多文献已经亡佚，极难考知。对于通行文献而言，难处在于如何辨别初源、甄别去取；对于亡佚文献而言，难处在于如何能藉由蛛丝马迹，正确寻绎。因此，对《经义考》文本予以溯源，有所错讹，在所难免。陈

开林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补正》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引文考辨十二则》二文,旨在纠误、补阙,即缘此而作(见前揭)。

朱彝尊身历明清易代之变,长期奔波江湖,赖有惊人之毅力、强大之学术交流网络,方能纂成《经义考》三百卷之巨著。学术发展至今日,文献资源获得之难度,已大为降低。因此,当下经学文献之整理,最难者不在于查检文献,而在于甄别去取,正确考溯初源。从文献整理之角度来审视《疏证》,难免有所不足。

(一) 缺少整理要素

作为经学文献整理、考证之专著,《疏证》仅于篇首有简短之缘起,而缺少应有的说明与交待。如果同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及《经义考新校》相比较,《疏证》尚缺少凡例和文献传本信息两个方面的关键要素。

1. 凡例

任何一部高水平的文献整理著作或学术论著,都有其行文准则与内在规范,此即凡例。对于文献整理而言,凡例尤为重要。例如,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之《点校凡例》,即交待了整理时所依据之底本、参校本,各项内容之次序、标点方式等等,全书因此眉目清晰,条理畅然。凡例不明,必然影响到文献整理的行文水平与读者的使用效率。

例如,关于如何引入文献出处的问题,由于缺少凡例的约束,《疏证》在引入文献时,便无一定之规。兹举数例:

语见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卷一五。《正义》曰:……^{[3]14}

汉韩婴《韩诗外传》卷五:……^{[3]17}

汉戴德《大戴礼记》卷三《保傅第四十八》:……^{[3]13}

《汉书》卷七五:……。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七:……^{[3]20}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:……^{[3]23-24}

语见《后汉书》卷四八。^{[3]29}

南朝宋范曄《后汉书》卷六四《吴延史卢赵列传》:……^{[3]30}

语见汉贾谊《新书》卷八《道德说》,原文为:……^{[3]17}

汉牟融《理惑论》:……。 (友按:文末出注,云:“梁释僧祐《弘明集》卷一。”)^{[3]22-23}

梁释僧祐《弘明集》卷一引《理惑论》:……^{[3]27}

唐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卷九五引杨泉《物理论》云:……^{[3]38}

明昌翰林六年学士党怀英《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》…… (友按:文末出注,云:“载四库本《山东通志》卷一一之七。”)^{[3]140-142}

可见,关于经传、史传、子书等之称引,文献、卷次、篇目与责任者之组合,称引文献与据以析出文献之位次等,《疏证》尚无定则。倘有凡例加以规范,即能整齐其类例,不致参差。

2. 文献传本信息

《经义考·通说》以选录前儒论说或摘录文献记述为主,因此涉及大量文献;《疏证》考溯引据文献之初源,同样涉及各种文献。而对于文献传本信息,《疏证》大都未予交待(仅部分脚注/校记中有所注出。此类注文,集中于《说纬》部分)。所谓传本信息,除文献名称外,尚包括责任者、版本或版次、页码等。《疏证》并非古人著述,而是当代学术著作,理应遵循当代学术规范。但该书既未能对传本信息一一分别注出(注出者鲜),也未能于全文之末附上引据书目,致使所涉文献传本面貌不明,大大影响了《疏证》文本之可信度。

由于凡例、文献传本信息的缺失,《疏证》许多内容令人费解。例如,《说经中》第二十七条“邹浩曰”,《疏证》出校云:

邹浩,吏部侍郎,字志完,常州晋陵人。中进士第。历扬州颖昌府教授,元祐七年除太学博士,出为襄州教授。大观四年复直龙图阁。政和元年卒,年五十二。^{[3]91}

按:以上显然是对邹浩简要生平事行之介绍。问题在于,《疏证》对于《经义考》内“某某曰”之“某某”身份,并未全部加以引介。那么,何者当介绍,何者当忽略?其中依据是什么?此其一。其二,本处关于邹浩之介绍文字,源于何种文献?应予交待。

又如《说经中》第三十条(“晁说之曰”):“五采具而作绘,五藏完而成人,学者于《五经》,可舍一哉?”《疏证》注“五采”“五藏”云:

①五采,指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种颜色。荀子《赋》:“五采备而成文。”

②五藏,即五脏。指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。中医谓“五脏”有藏精而不泻的功能,故名。《素问·五脏别论》:“所谓五藏者,藏精气而不泻也。”《管子·水地》:“五味者何?曰五藏。酸主脾,咸主肺,辛主肾,苦主肝,甘主心。”^{[3]93}

《疏证》以上两条注文,系对引据文献中“五采”“五藏”加以解说。然《疏证》此前,并无先例,何以此处需要出注?如果有规律可循,那么,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众多,涉及名物不可胜计,何者当出注解读?

又如《说经中》第三十六条(“苏籀曰”):“昔仲尼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惟举要发端,不详其言,非不能详也,以为详之则隘,故略之,使仁智者自求而得。”《疏证》明其出处为苏籀《双溪集》卷九《初论经解札子》,并节引其文以明初源。引文首云:“臣闻圣经贤传,唐虞三代所遗;阙里之业,王者乐道尊儒。”于“阙里”二字出注云:

阙里,孔子故里。在今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。因有两石阙,故名。孔子曾在此讲学。后建有孔庙,几占全城之半。后借指曲阜孔庙。又借指儒学。^{[3]99}

此条所注,已非《经义考》引据之文,而是整理者用以考证之文,更为泛滥无归。阙里作为孔子故里,也系常识。实际上,就全书通例而言,以上三例,似均无出注之必要。

以上所举,是否应当出注,因无统摄之例,便不明所以,造成行文体例之前后不一。同时,由于缺少传本信息,《疏证》所费力考溯之文本初源,即难以令人放心称引。如此后果,实有违于《疏证》之初衷。前揭《疏证序》云:“删去岁月,不注出处,此二点正是《经义考》的最大缺点……这些致命弱点无疑大大降低了它的学术价值,也影响了它作为工具书的使用效率。”执此返视《疏

证》，虽注出处而无凡例、不交待版本信息，其实也有损于《疏证》作为经学文献整理著作的学术价值。

(二) 标点不尽准确

经学文献之整理，其事匪易，最难者往往不在寻绎初源，而在看似平凡之标点。《疏证》之标点，也颇有可商之处。

1. 标点未能正确显示文献之层级

例如《说经上》第六条（“管仲曰”）：“内不考孝弟，外不正忠信，泽其《四经》而诵学者，是亡其身者也。”《疏证》云：

语见《管子》卷一〇《戒第二十六》。唐房玄龄注：“内不考孝弟，言不仁。外不正忠信，言不友。泽其四经而诵学者，是亡其身者也，四经谓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既无孝弟忠信，空使四经流泽，徒为诵学者，即四经可以亡身也。”^{[3]14}

按：《疏证》于探其初源之后，另录房玄龄之注，以明其所指。初读之下，颇以房氏所注，颇类经解之章句体（如《公羊传》、孔颖达《正义》等）。实际上，上揭文内“言不仁”“言不友”“四经谓……可以亡身也”等句，分别是《通说》所引“内不考孝弟”等三句之注文，在原书内，以夹注形式出现。《疏证》当加以转写。

2. 断句未当，标点有误

例如《说经上》第七条（“赵衰曰”）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义之府也；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德之则也。”《疏证》云：

语见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卷一五。《正义》曰：说谓爱乐之敦谓厚重之。《诗》之大旨，劝善惩恶，《书》之为训，尊贤伐罪，奉上以道，禁民为非之谓义。《诗》《书》，义之府藏也。《礼》者，谦卑恭谨，行归于敬乐者。欣喜欢娱，事合于爱，揆度于内，举措得中之谓德。《礼》《乐》者，德之法则也。心说《礼》《乐》，志重《诗》《书》，遵《礼》《乐》以布德，习《诗》《书》以行义，有德有义，利民之本也。《晋语》云：文公问元帅于赵衰，对曰：郤谷可年五十矣，守学弥惇。夫好先王之法者，德义之府也。夫德义，生民之本也。能敦笃不忘百姓，请使郤谷公从之。^{[3]14-15}

按：《疏证》在指明文献初源之后，复引孔颖达《正义》以补充说明之，正合“通说”之义。然文中首句“说谓爱乐之敦谓厚重之”，语意晦涩；“郤谷可年五十矣”“请使郤谷公从之”，令人费解。核其实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，“（晋）搜于被庐，作三军，谋元帅”。赵衰因建言曰：“郤谷可。臣亟闻其言矣：说《礼》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《书》。《诗》《书》，义之府也。《礼》《乐》，德之则也。德、义，利之本也。”上揭孔颖达《正义》，系疏解赵衰之语而发。宜标点作：

《正义》曰：“‘说’，谓爱乐之。‘敦’，谓厚重之。《诗》之大旨，劝善惩恶。《书》之为训，尊贤伐罪。奉上以道、禁民为非之谓义。……心说《礼》《乐》，志重《诗》《书》。遵《礼》《乐》以布德，习《诗》《书》以行义。有德有义，利民之本也。《晋语》云：‘文公问元帅于赵衰。对曰：‘郤谷可。年五十矣，守学弥惇。夫好先王之法者，德、义之府也。夫德、义，生民之本也。能敦笃不忘百姓，请使郤谷。’公从之。’”

(三) 考溯出处未尽

如前揭《说经上》第五十四条（“葛洪曰：《五经》为道德之渊海。”），《疏证》云：

《抱朴子外篇·尚博》：“抱朴子曰：正经为道义之渊海，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……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，操纲领而得一致焉。”按：正经，指儒家经典。而《经义考》误作“五经”。^{[3]38-39}

按:此条《疏证》,已能指出“五经”乃“正经”之误,但仍有几点颇可议者。

第一,细读文本,知“道德”二字,《抱朴子》实作“道义”。

此异《疏证》未予指出。

第二,考《抱朴子外篇·百家第四十四》:

“抱朴子曰:百家之言,虽不皆清翰锐藻,弘丽汪濊,然悉才士所寄心,一夫澄思也。正经为道义之渊海,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仰而比之,则景星之佐三辰;俯而方之,则林薄之裨嵩岳。”^{[6]441}其中也有“正经为道义之渊海”等句。那么,《百家》篇所载,也有可能是《经义考》之初源。

第三,检《太平御览·学部·叙经典》:

“抱朴子曰:正经为道德之渊海,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犹北辰之佐三辰,林薄之依高岳。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六〇八)^{[7]2736}《经义考》所引“道德”二字,很有可能据《太平御览》析出。

又如《说经上》第七十条(“王通曰”):“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,《三传》作而《春秋》散。齐、韩、毛、郑,《诗》之末也;大戴、小戴,《礼》之衰也。《书》残于古今,《诗》(或曰:‘当作《论》。’)失于齐、鲁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)《疏证》指出,此段文字,本于王通《中说》卷二《天地篇》:“子曰:‘盖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,《三传》作而《春秋》散。’贾琼曰:‘何谓也?’子曰:‘白黑相渝,能无微乎?是非相扰,能无散乎?故齐、韩、毛、郑,《诗》之末也;大戴、小戴,《礼》之衰也。《书》残于古今,《诗》失于齐鲁,汝知之乎?’”“当作《论》”三字,显系朱彝尊自作夹注。《疏证》于此三字下出校,云:

今按:或曰非也。当作“诗”。宋阮逸注:“齐辕固生治《诗》,为博士,齐人宗之。鲁申公汉初为儒学,鲁人宗之。于是有齐、鲁《诗》。”^{[3]50}

按:据《经义考》夹注,知朱彝尊认为,“《诗》失于齐鲁”,也可能作“《论》失于齐鲁”。至于其中理据,未予说明。《疏证》据阮逸为王通《中说》本句所作注,认为《经义考》之夹注有误,至于朱彝尊何以夹注,未予考察。考王应麟《困学纪闻·诸子》,论及《中说》,有云:

“《诗》失于齐、鲁”,当从龚氏本云“《论》失于齐、鲁”,谓《论语》也。上文已言“齐、韩、毛、郑,《诗》之末也”,不当重出。(《困学纪闻注》卷十)

王应麟依据传本(“龚氏本”)、文理(前文已言“《诗》之末”),认为此处当作“《论》失于齐、鲁”。翁元圻注云:“唐李行修《请置诗学博士书》云:‘《书》残于古今,《论》失于齐鲁。’正用文中子语,可以证龚本之不误。”(《困学纪闻注》卷一〇)^{[8]691}朱彝尊自注之“或曰”,其实即本诸王氏此说。《疏证》径断其误,而未遑及此。

(四)出注不合通例

《疏证》专以疏通证明《经义考》所引文献为职志,尤以考溯文本初源、指正文字讹误要务,撰者有所申论,正文中即能发挥(《疏证》有“今按”之设置),因此除非必要,一般不宜出注(脚注)。《疏证》偶有出注,起标明文本异同之作用,自无不可。例如,《说经上》第十七条(“贾谊曰”),《疏证》引贾谊《新书》“鬼神以与于利害”“受博学以达其知”,出注两条:

“以”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《贾谊集·新书》作“能”。^{[3]18}

“受”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《贾谊集·新书》无，而四库本《新书》有，似为衍文。^{[3]18}

以上二注表明，作者在考溯文本初源时，曾参考今人整理本。注出文本异同，以备考核，属于通例。同是本条，作者又能校正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之误：

今按：……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第八册第 768 页将“贾谊”误作“陆贾”。^{[3]18}

此条同前揭《说经上》第四十四条（“（荀悦）又曰”）内“今按”一例，均指正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之误，体例允洽。此类按语，其功用相当于校记。

但有些注文（校记），于例未安。例如，《说经上》第十九条（“（董仲舒）又曰”）内，“《春秋》正是非，故长于治”，《疏证》于“正”字出注云：

今按：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第八册第 769 页夺“正”字。^{[3]19}

此条注文，实同上揭《说经上》第十七条（“贾谊曰”）内“今按”功用相同，当循例置于正文为宜。

又如《说经上》第七十二条（“牛弘曰”）：“周德既衰，经籍紊弃，孔子以大圣之才，开素王之业，宪章祖述，制《礼》刊《诗》，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，阐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”《疏证》引《隋书·牛弘传》，内有“昔陆贾奏汉祖云：‘天下不可马上治之’”，出注云：

陆贾曰：“陛下马上得之，不可马上治之。”^{[3]53}

按：此注显然在追溯“天下不可马上治之”之语源。但此注同要疏通证明之牛弘之文，并无直接联系，作者将其作为读书零札则可，若将其作为注文而入《疏证》，即同上揭出注之通例不合。

又如《说经下》第三十九条（“方鹏曰”）：“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一也，汉人读之为训诂之学，唐人读之为辞章之学，今人读之为科举之学，盖读之者同，而用之者异也。”，《疏证》指出其出处为“明方鹏《矫亭存稿》”，出注云：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七十六《矫亭存稿》提要：“十八卷、《续稿》八卷，明方鹏撰。是集诗文多应酬之作，所载笔记亦无所发明。”因此列入存目。^{[3]211}

按：此注明方氏《矫亭存稿》何以入四库存目。所揭事实，同需要考溯之文本初源，并无直接关联，是否有必要出注，值得推敲。

（五）载录原文过长

备列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之全本，使其中文本之讹脱衍倒等情形，不言自明，是《疏证》之一大优点，已如前述。但所引文献之“全”，以何为度，其实颇值探讨。《疏证》中部分文本初源，载录过长。例如，《说经上》第六十五条（“（刘勰）又曰”）：“圣哲彝训曰经，述经叙理曰论。”（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）此见于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论说第十八》卷首。《疏证》将《论说》全篇照录，^{[3]46-48}达千余言。又如《说经上》第七十二条（“牛弘曰”）：“周德既衰，经籍紊弃。孔子以大圣之才，开素王之业，宪章祖述，制《礼》刊《诗》，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，阐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”此牛弘上书请开献书之路之表文。《疏证》遂将牛弘里贯

及表文,自《隋书》中析出,文字长达 1700 余言,^{[3]52-54}诸如此类,未免过于冗长,转录过当。

此外,《疏证》在引据文献时,偶有未谙古文体例而解读有误者。例如《说经中》第八十七条(“党怀英曰”):“六艺者,夫子所以传唐、虞、三代之道,众流之所从出,而儒为之源也。”《疏证》考其出处为“四库本《山东通志》”所载“明昌翰林六年学士党怀英《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》”^{[3]140}。其中“明昌翰林六年学士”,莫明所以。检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(按:《疏证》所谓“四库本”,即指此本)《山东通志》,知此数字均为夹注之文,分作“明昌六年”“翰林学士”两段,中间空一字距。由于夹注双行书写,《疏证》显将纵行连读,致文次失序。明昌(1190—1196),金章宗完颜璟年号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,《疏证》以考溯《经义考》通说部分之文献初源为职志,或径明文献之初源,或兼列其他可能出处,或兼释所引文献,或备列引据文献之全本,或兼考其他文献之异同,共考出 438 则引据资料之出处,约占该部分引据资料之 88%。如虑及古典文献之浩如烟海,亡佚文献之艰于探寻,此一整理成果,无疑极为丰硕。司马朝军《疏证序》云:“我们无意否定朱彝尊的历史功绩,也无意贬低《经义考》的史料价值,只是想这部名著更加熠熠生辉,更加完美无缺。我们有意成为朱彝尊之诤友、《经义考》之功臣,只是想做一点有利于学术的善事而已。”^{[3]108}事实上,《疏证》虽偶有不足,但其丰硕之考溯成果,不仅有功于《经义考》,也为经学文献之整理,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,足以当得“朱彝尊之诤友、《经义考》之功臣”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陈开林.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补正[J].图书馆研究与工作.2015(2):67-71.
- [2]陈开林,齐颖.《经义考·通说》引文考辨十二则[J].贵州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5(3):109-115.
- [3]司马朝军.《经义考·通说》疏证[M]//国故新证.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0.
- [4]司马朝军.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序跋[J].出版科学,2011(1):106-108.
- [5]朱彝尊.经义考新校[M].林庆彰,蒋秋华,杨晋龙,等,主编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.
- [6]杨明照.抱朴子外篇校笺: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1.
- [7]李昉,等.太平御览(影印宋本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8]翁元圻.困学纪闻注[M]//续修四库全书:1142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